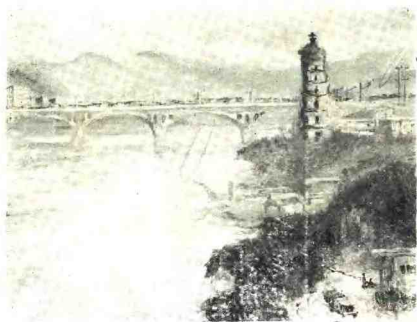


19.05

仁化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仁化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71/05

仁化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仁化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仁化坚持武装斗争的

- 回 顾**……………叶昌（1）
- 年内混战时期滇军火烧扶溪情况……………卢毓云整理（21）
- 康溪乡农民运动纪事……………李焕坤 何莹娟（25）
- 仁化三青团始末……………周云（28）
- 凡口矿山发展史**……………（31）
- 建国后仁化扫盲工作的回顾……………赵安（41）
- 仁化历史沿革初探……………张树棠（49）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仁化

坚持武装斗争的回顾

叶 昌

广东仁化县是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县，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斗争中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锻炼。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成立了农会，有的乡村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仁化县的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中国革命中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回想过去的战争年代，我们在仁化坚持武装斗争的艰苦残酷的环境里，没有那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要把革命斗争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设想的。而今，看到广大农村在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大部分农村还用上了电灯，这就使我想起解放战争中在仁化县开展武装斗争的情景，那时群众对革命斗争的支援和帮助，与我们乳水交融的关系，就象屏幕一样，一幅幅地呈现眼前。特别是长江、扶溪、城口等山区，如凌溪、曾洞、禾镰洞、坭洞、塘洞、陈奢、欧奢等村庄的群众，他们和游击队亲如一家，

无论环境如何艰苦，斗争如何激烈，敌人如何威胁和恐吓，他们毫不动摇、毫不妥协，和我们站在一起跟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使武装斗争不断获得了胜利。

一、挺进粤北

我原在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任大队长，那时部队活动于东江惠阳、博罗一带。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起了变化，我军转入反攻阶段。党中央为了开创华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更有力地打击侵占华南的日寇，派遣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延安南下，配合我华南抗日武装在粤、赣、湘三省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东江纵队派出部队北上粤北迎接“两王”部队，由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麟云组成粤北指挥部率队北上。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东纵第五支队和东纵干校学员一千二百余人从博罗横河出发，经龙门、新丰、从化、翁源到达始兴，与始兴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风度大队在青化、隘子会师，部队休整几天后，由风度大队带路，绕过始兴县城，经江口横渡浈江到达下北山宝丰，指挥部派人去了解 and 联系“两王”部队的情况。当时群众传说“红军”（即“两王”部队）由江西大余到了南雄的横水，经百顺去仁化的长江、城口过湖南去了。派出去联络的同志未会上“两王”部队。据指挥部获悉，“两王”部队到达北山后，受到了国民党调集大量反动军队进行前堵后击，而又未会到东纵北上部队，那时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情况起了变化，党中央已电令“两王”部队回师北上。东纵司令部根据新的情况电令我们北上部队留在粤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指示五支

队就以内良、河洞、白云一带山区为基地，向文英、洛洞发展，并几次打进长江圩。

二、留下坚持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广东坚持抗日的我党武装东江纵队，为了执行党中央与国民党签定的“双十协定”，奉命撤出广东抗日根据地，北上山东烟台。当时我们在粤北地区活动的部队，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粤北指挥部决定以黄业为首留下近二百人的武装，分别隐蔽在南雄的帽子峰、油山，始兴的南山和下北山，以及位于粤赣湘三省边界的江西洛洞及长芦。当时，我带着三十余人就隐蔽在离洛洞五华里的浪石村，该村属江西崇义、文英乡，村背后是横跨三省的风火山，山背靠仁化长江的坳湖、塘洞，山左侧靠湖南汝城的热水、鱼王，山高林密，地形很好，又是三省边界，这样的崇山峻岭，很有利我们游击队活动。这带群众基础也好，是过去陈毅、项英同志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对共产党、红军有较深感情，部队未北撤前我就带部队在这一带活动过，群众对我们很亲热，称我们为红军。

部队北撤时，指挥部对我们留下来有明确指示，在大部队南下沙鱼涌集中北撤，未到达烟台前这段时间，要转入深山丛林绝对隐蔽，不能给国民党发现我部队留下的根据。否则国民党就会借口说我们不执行“协议”，会借机打击我们正在北撤的部队。要我们待北撤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才能公开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又没有和地下党接上关系，我们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党的政策影响教育群众来帮助我们。我们除做好洛洞和浪石村的群众工作外，还在长江圩的坳湖、塘洞等村发动群众。在坳湖我们争取了当地一位较

有名望的老绅士刘默三先生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些群众的关系，秘密地帮助我们给养和提供情报。国民党怀疑有我们的武装留下来，但不知道在那个地方隐蔽。他们只能白天有时到山上盲目搜一遍，或在圩镇盘查群众，看群众是否帮助游击队采购粮食和日用品，想通过这些办法来了解游击队的情况。那时群众帮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有生命危险，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抄家、杀头的危险。我们隐蔽期间，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帮助，困难是难以克服的。

我们安全地隐蔽了将近有两个多月。我们电台收到了东纵北撤部队到达烟台的消息，在九月间由黄业同志主持召开了主要领导干部会议，研究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我们根据当时国民党“扩大内战，实行征兵、征粮、征税”，残酷压迫老百姓的“三征”反动政策，决定发动群众向国民党这一反动政策开展坚决的斗争。因还没有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当时就以群众起义的面目出现，公开打出旗帜。南雄油山隐蔽的队伍举起“雄、余、信人民反征义勇团”的旗帜，以油山为基地，向南雄乌迳、大塘、邓芳等平原发展，我们这边也以“仁、崇、汝人民反征救命团”的旗帜，团长刘雄虎，后改为刘冠英（我当时的化名）坚持在三省边界活动，向仁化的长江、江西大余的内良、河洞、南雄的白云等地发展。为了狠狠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三征”政策，镇压为这一反动政策服务的反动政权及其武装，我们选择了长江乡公所联防队和警察所，作为我们开展公开活动的第一个打击对象。

三、攻打长江

长江位于粤、赣、湘三省边界，属于广东仁化县境，是粤北的一个重要圩镇，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三省都能产生较大的震动和影响。它有店铺和居民近三百户，距县城有四十多公里，水路有锦江直通仁化县城和韶关，山路可与汝城、崇义、大余、南雄相通。圩内街道小巷纵横，商店云集，每逢三、六、九日圩期，人群拥挤十分热闹，长江玉扣纸、黄烟是当地有名的土特产。湖南、江西、南雄许多土特产山货都在这里成交。

国民党对长江圩的控制极为重视，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在五支队还未北撤烟台期间，我们部队曾几次攻打过长江，每次打进去住了几天，敌人就组织兵力进行反扑，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重点。后来国民党知道我们主力部队已北撤走了，就在圩内设有乡公所和警察所，驻有一个排的联防队及一个班的警察武装人员。

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先将部队从洛洞秘密运动到离长江圩三十多华里的禾镰洞山上隐蔽。当时配合一起行动的还有隐蔽在河洞、内良、长芦的刘裕安、邹裕光、李春、曾春辉等十多位同志，和黄业同志留下的警卫排李生贵带的一个班，合计有六十人左右，兵分两路，采取突然袭击，分别解决这两个据点的敌人。部队在战前把准备工作做好后，就在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部队静悄悄地从禾镰洞出发，到了离长江圩约一里的里周坳，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保英带队插向警察所，另一路由刘裕安带队扑向乡公所联防队。刘裕安队进圩后迅速解决了乡公所

联防队武装，活捉乡长及联防队长以下二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但张保英队在警察所遭到了阻击，警察所设在一条巷内，是座居民楼房，街道狭窄弯曲，当部队接近时就和敌人打上了。同志们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勇敢战斗，在黑夜中向警察所勇猛地冲击，占领了警察所的一楼，把敌人压制在二楼上，张保英同志向二楼冲击时，不幸中弹倒在楼梯口牺牲了。因地形不利，没能把警察所攻下，我们只好在天亮前撤出了长江的战斗。

这次战斗虽然没有解决警察所的武装，却砸掉了乡公所，消灭了联防队，在军事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并在圩内张贴布告，宣传我军的宗旨，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使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游击队还在粤、赣、湘边地区活动，扩大了政治影响。袭击长江后，四乡群众纷纷传说：“共产党没有走，游击队回来了。”又说：“打长江圩游击队有好几百人。”使国民党的地方团队非常惊慌，不敢随便下乡征兵要粮了。

这次战斗虽然扩大了政治影响，但我们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付中队长张保英同志和张建华、黄禹平两同志，大家内心都十分沉痛难过，这三位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在坚持隐蔽的艰苦生活中，处处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不叫苦，毫无怨言地带领战士克服困难。在隐蔽时张保英经常对我说：“大哥（当时同志们这样对我称呼），将来革命胜利了，把我们的隐蔽生活写成小说，看那多有意思。”他那种天真乐观，纯朴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铭记我心中。

张保英同志原在国民党独立九旅当排长，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于一九四四年毅然

起义，带一个排二十多人和俺参加我东江纵队。一九四五年编入五支队挺进粤北，东纵北撤时随我留下，坚持粤、赣、湘边斗争。他为人爽直，对同志热情。张建华、黄禹平两同志，当时只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鬼，一个是班长，一个是通讯员，他们活动机灵，在执行战斗、交通和侦察等各项任务时，却能出色地完成。这三位同志的牺牲，是我们游击队的重大损失。当时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禾镰洞开追悼会，悼念这三位同志，把悲痛化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血债，誓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扶溪伏击

我们袭击长江后，不再在山上住茅棚了，部队公开向凌溪、高坪、朱岸塘一带发展，住在人村里。黄业同志率领的领导机关也从帽子峰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凌溪，广泛发动群众支持部队。我们加强了对长江这一据点敌情的谍报工作，利用群众中在长江有亲戚和其他关系的人，安排他们了解长江或仁化敌人的动态。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一天，我们部队住在凌溪高坪接到安排在长江搞情报的群众温和英大姐送来的情报说：“仁化县伪政府于明天派一个排的武装护送两担钞票及一批物资到长江（当时纸币不值钱，用肩挑），作为地方反动武装的经费。”我们获得这一情报后，非常高兴，即与黄业同志研究后，我当晚即率领刘裕安和卢志光的队伍，从凌溪高坪出发，沿着山间小道急步前进，在拂晓前赶到了伏击点——漏茂。漏茂位于仁化扶溪至长江的中间，离长江有十多里路，该地两边都是高山，路从中间通过，傍也有一条由长江流向仁化约十多米宽的锦江河，是比较理想的埋伏地

方。我即布置由卢志光带突击队，他带着陈春、张发、陈荣坤、潘金稳等二十多位同志，埋伏在路旁的灌木芒草丛中，刘裕安带一个队员负责警戒和伏击逃敌，我带着两挺机枪在山腰负责掩护和指挥。

中午时分，嘹望哨发出信号，报告敌人从扶溪方向来了，我立即发出命令，要部队做好隐蔽，准备战斗。约过十多分钟，就发现三、四十个敌人护卫着几担东西，朝我们伏击圈来了。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受到突然的打击，惊慌失措，想跑也来不及了，退路已被刘裕安切断，埋伏在路旁的突击队，象猛虎一样冲向敌群，冲锋枪、手榴弹、快制驳壳子弹在敌群中开花，一阵“乒乒乓乓”敌人就倒下了七、八个，其余二十多个敌人举手投降当了俘虏，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歼灭了敌人一个排，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钞票两担及物资一批，俘虏经教育后释放，我方陈荣坤同志受伤，每一个战士都背着缴获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唱着嘹亮的歌儿返回凌溪营地。这一战斗的胜利，给部队解决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要感谢温和英大姐所提供的情报。

五、保卫凌溪

一九四七年春，我们隐蔽在粤北各地的人民武装，高举反内战、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旗帜，向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坚决的打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横扫了大余、信丰、南雄、仁化、始兴等县二十多个乡公所。我们攻打长江后，不久又消灭了白云自卫队二十多

人，我们就以禾镰洞、曾洞、凌溪、高坪、朱岸塘以及内良、河洞、长芦、长岭、流岗、黄金寮一带为基地，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凌溪已成为粤北地区的领导中心。为了加强粤、赣、湘边武装斗争的领导，广东党的领导机关华南分局，派了张华同志十二月份带领一批干部从香港来到部队，并在凌溪成立了五岭地委，由张华同志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五岭地委在凌溪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根据华南分局领导方方、林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研究发展武装斗争问题，决定成立粤、赣、湘人民解放总队，总队政委为张华同志，总队长为黄业同志，刘建华为付总队长，陈中夫为政治部主任。根据各地区武装的活动范围，下设四个支队，我们仁、崇、汝人民反征救命团，改为第一支队，我任支队长，政委由黄业同志兼。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粤、赣、湘边武装斗争向前推进的一个新起点。这次会议后，五岭各地的武装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活动地区也不断扩大。凌溪是领导机关所在地，影响很大。当时，国民党想扑灭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凌溪成了主攻目标。五月间，韶关国民党抽调一个团的兵力，由仁化县城经长江，向我地委领导机关——凌溪高坪村进行大扫荡，敌人来势凶猛，兵分两路，一路由风门坳到曾洞、禾镰洞，迂回向我包抄过来；另一路由里州正面向我凌溪进攻，声称要在凌溪将我军消灭掉。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总队领导考虑到，既不死守一个点和敌人硬拼，又要保卫根据地人民身家性命的安全，给敌人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支队根据总队的意图，由卢志光带一个队负责伏击风门坳的来敌，另由刘裕安带一个主力队，并带上地雷在正面里州来路伏击。队伍部署好后约九点

来钟，敌人大约有好几百人配有轻重机枪和六〇炮从里州上来了，从里州到凌溪是上山放道，傍山弯弯曲曲而上，两旁竹林菜桶丛生，敌人非常警惕，先派遣小部队尖兵搜索，大部队就由后面跟上来，由于敌人兵力多出我们好几倍，刘裕安避过敌人尖兵，看敌人进入伏击范围，拉响一个地雷，炸得敌人嚎哭狼叫，机关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射击，使敌人当场伤亡就有十多人，敌人依靠人多，重新组织力量向刘裕安队进行反扑。当时刘裕安队陈石养小队有一小鬼班，由班长张发、付班长陈石养带领，埋伏在离敌人最前的小山头上，敌人对他们这个小山头，接连组织上十次的冲锋，由于小鬼班的英勇顽强，加上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无法前进，在山下倒下了八、九具尸体。

这次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四点钟，总队机关和群众已安全撤出了凌溪，阻击任务完成了，我们撤出战斗。刘裕安通知张发班作掩护，张发为了使班里同志以交叉火力掩护撤退，要陈石养带两人迂回到右侧小山头牵制敌人，就在他们通过大路时给敌人发觉了，陈石养大腿受了伤，不能走动，其他两个小鬼见他受伤，要把他扶起背走。他坚决不肯并命令其他两人不要管他，赶快撤退，由他来掩护，当看到他俩已撤出时，陈石养才从路边一个翻滚，滚落坑底，忍痛爬进浓密的芒草中。敌人发现有人滚下山坑，跟着下山进行搜索，猛叫要抓活的。敌人用刺刀乱捅草蓬子，有几次刺刀在他身边划过，他沉住气把手榴弹的弦线扣在手指上，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搜了一个多小时没搜着，天已近黄昏，只好吹号集合走了。敌人走后，他想爬起来，但腿不听指挥了，一看左腿已被打断，血流不止，身边没有救急包，他就抓起泥土一把把往伤口里塞，刺心的疼痛使他几次晕了过去，伤痛使全

身象火烧一样，干焦的口腔也象在火烧，他当时多么想喝水，哪怕是一口也好，他环顾四周都没有水，那时喉龙在发热，任你怎样转动舌头，也挤不出半点唾沫，要坚持下去是陈石养唯一的信念，最后喝自己疴出来的尿水止渴。他坚信同志们一定会来找他。事后第三天我们在一条山坑底找到了他，只见他面色苍白，一条腿已肿成象水桶般大了，伤口化脓有虫子爬出来，去找他的同志见到这种情况，心痛地说：“石养同志，这几天你真够受苦了，支队长下令要我们一定把你找回来，我们找了两天都找不到你，以为你已被俘了。”他指指身边的手榴弹说：“当俘虏，没那么容易，只要有口气，就要和敌人拼到底，大不了就与敌人一起报销！”一边说，一边用手把爬出伤口的粗虫一条条捉掉，同志们都被他顽强不屈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部队撤出战斗后，敌人还不敢一下子进驻凌溪，到处派人搜索山头，放好军事哨，控制各路口和山头，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敌团部才敢进驻凌溪。我们当晚又组织对敌进行袭扰，使敌人一晚不得安宁，第二天敌人抢了群众许多东西，烧了禾镰洞、曾洞、凌溪一部份房舍，还杀了群众几条猪和牛，就匆忙撤回仁化去了。

六、二打长江

一九四七年五岭地委领导的粤、赣、湘人民武装斗争已取得了全面的发展，横扫了南雄、仁化、大余、桂东等县的区乡伪政权，给当地封建势力和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投入到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成立民

主区乡政府，组织民兵常备队和参军参战保卫家乡。我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大、小战斗的胜利，整个地区的武装队伍也迅速扩大有三、四千人。广东国民党不甘心他的灭亡，对粤北人民武装的发展和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极为恐慌。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广东国民党省府主席宋子文匆匆忙忙将在苏北战场上遭到惨败回来广东休整的“隆昌”部队（国民党六十九军）调到粤北韶关，策谋对我五岭武装进行全面“围剿”。采取“占据平原，围困山区”的战术，妄图“消灭不了我们，也要困死或饿死我们。”

敌人进攻我们的重点是南雄横水一带，那里已成为我们领导机关的基地，敌人为了配合他们在南雄那边搜剿我们，曾派一个营的兵力驻守长江，不久退回韶关去了。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张华和我率领一支队主力，从南雄横水转到三省边界洛洞地区，我们到达洛洞后了解到这一情况，抓住这一时机，并配合南雄方面反扫荡斗争，经与张华研究决定二打长江。

我们立即派出劳火、廖明带一个小队到长江陈奢、欧奢、坭湖、塘洞一带活动侦察情况，还派陈少华带赖苟、方生等二十多人在冷饭坑、泥壁岭设站收税，又派卢志光、陈春等人到凌溪、曾洞发动群众，并负责与长江圩的内线联系了解情况。我们安排在长江的内线温和英，她是曾洞人，在长江圩做小贩谋生，经常来往于长江——凌溪——曾洞之间。她为人机灵，对革命有认识，她热情帮助部队，又是妇女，不大被敌人注意。我们在扶溪打伏击的情报就是她提供的。

长江的敌人，经我们第一次打击及扶溪伏击后，国民党地方反动头子周文山加强了它的防务，扩充了地方反动武

装，收容许多国民党兵痞，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自卫中队，装备了机枪三挺；纸行商会老板也成立了一支护路队，有50余人，配有一挺轻机枪和一支卡宾枪；警察武装也扩大80多人；圩内比以前防范严密，修筑了工事，街口和进出的圩门都打了木桩和设了栅门，对来往群众加强了检查。

我们考虑到当时自己还不足200人的主力，要想解决那么多的敌人是不可能的，计划集中兵力消灭自卫中队和乡公所，决定由刘裕安带主力陈春、邹裕光、张发等小队去消灭乡公所自卫中队，由卢志光、劳火各带一个分队，分别负责对警察所和纸行护路队的警戒，阻击敌人，增援并伺机消灭敌人。

为了便于袭击长江敌人，我首先将部队从洛洞转到凌溪高坪集中。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初的一天黄昏，部队从高坪出发，九时左右抵达长江圩外，停留稍作检查准备，随后各队按布置进圩的路线执行任务，刘裕安率队悄悄地从小门摸入了圩内，向自己队攻击的据点冲去，因圩街窄小，地形复杂，队形不易展开和运动。当我们冲到据点前面时，敌哨兵已发觉我们，即开枪还击，敌人已作了应战准备，刘裕安立即组织火力进行强攻，顿时，枪声惊醒了沉静的长江圩，双方枪战两个多小时，我们冲进了自卫队据点——乡公所，伪自卫队士兵被我们勇猛战斗精神吓破了胆，前院的两个班敌人纷纷丢下了武器举手投降，后院的敌人慌张地爬墙逃命，伪乡长曾仁厚当即被我游击队击毙，俘敌十多人，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及一大批物资，天亮前撤出战斗，胜利地返回凌溪高坪。

七、“两邓”投奔游击队

我们二打长江后，对敌人震动很大，特别是长江圩自卫队内部，军心动摇。早晚都怕游击队来打他们，这些自卫队除少数是国民党兵痞流氓作为骨干外，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民被迫拉来当兵的，都不愿为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卖命，就在我们第二次打了长江后不久（约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自卫队的正、付班长邓绍田、邓绍仁（他们两是堂兄弟）串通谭华强、刘长胜、柯仔、刘华等七人，利用带班放哨之机，携带轻机枪两挺，步枪六支，子弹几百发，向我游击队投诚起义，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

“两邓”是长江木溪头村人（离长江三华里），出身贫苦，在家种田，被地方反动头子周文山拉壮丁当了自卫队，他俩在自卫队取得了周文山的信任，当上了自卫队的正、付班长。周文山是地方一个大恶霸，在长江任过国民党的乡长、区长、民团“剿匪”副指挥，是长江地区说话算数的统治者，是有势力的地方反动头子。“两邓”当自卫队后，一直伺机报拉丁之仇，我们部队在长江的活动影响不断扩大，他俩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是真正为劳苦大众着想队伍。向往共产党参加游击队，消灭周文山，在他俩思想上已有了考虑。当我们二打长江后，更加速了他们离开自卫队参加游击队的决心。他们了解到陈奢地方有游击队活动后，就毅然拉队伍出来到陈奢找寻我们。当地群众得知他们是真正脱离自卫队投向游击队的，立即把他们掩蔽起来，并通知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武工队长陈少华同志，陈少华与他们接头